

192108



湖南教師叢書之五

鄧幹于教育思想討論集

第一集

湖南教師編輯部

目 錄

爲什麼要重視鄧幹子教育思想和辦學活動的討論.....	唐 麟 (一)
湖南教育工作者應重視鄧幹子教育思想的討論.....	湖南教師社評 (五)
鄧幹子教育思想和辦學活動概述.....	新湖南報 (八)
揭發鄧幹子的真面目.....	吳繼顯等 (一二)
解放後鄧幹子的教育思想及教育活動.....	行素中學師生 (三一)
鄧幹子的教育思想與實際的批判.....	林 天 (三六)
我對鄧幹子教育思想的批評和自我批評.....	蕭敏頌 (四五)

為什麼要重視鄒幹于教育思想和

辦學活動的討論

唐 麟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告訴我們：「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在中國，有帝國主義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國的東西。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辦理的文化機關之外，還有一些無恥的中國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屬於這一種。在中國，又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親熱的兩兄弟，它們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這類反動文化是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的，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不把這種東西打倒，什麼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鬥爭是生死鬥爭。」（「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六六頁）

讀過「新民主主義論」的人是很多的，對於前面所引的這一段，當然也是注意到了的。但是，讀過或承認是一回事；確實領會其意義，結合實際情況打通思想，使它成為自己的實踐指南，又是一回事。我們不應只是止於讀書，而應進一步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去對具體的事物進行具體的分析，深刻反省，在實際的思想和行動上有所變革。湖南歷來是號稱文化教育比較發達的省區，歷來就是革命與反革命鬥爭尖銳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在湖南這個地方，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這兩個非常親熱的兄弟的反動同盟不是很弱，而是很強；不是沒有活動，而是非常猖狂，無孔不入的。帝國主義的文

化侵略在這裏有長遠的歷史和深厚的基礎。「新湖南報」從七月二十三日起連載的關於湘雅歷史的介紹，就是一個證據。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這一批最早代表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結成兇惡同盟來鎮壓中國人民革命運動的反動頭子，曾在湖南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傳統勢力，數十年來在文化教育界不斷地有「學者」「名流」「教育家」在為維持和擴張這種反動傳統勢力而煞費心血；並且這種傳統勢力一直保持著曾、左、胡與帝國主義深相勾結的特點。自蔣介石建立其反革命統治之後，反動派就在這個傳統之上披上「民主主義」外衣，注入法西斯血液，配合着對中國人民革命力量的軍事上的「圍剿」和「兼併」；在文化教育上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反動透頂的措施。這一切措施在湖南都是收到效果的。何鍵、朱經農之流，為了達到這個萬惡的目的，把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的各色武器，盡量施展，從「英美文明」到「八德新義」，從「四書五經」到「武術救國」，從「新生活」到「衛生麻將」，從居士林到佛羅殿，從「會考必備」到「中國之命運」……亂七八糟，烏煙瘴氣，把湖南文化教育事業弄得令人透不過氣來，湖南青年由此所受到的毒害摧殘，可謂「罄竹難書」。此外，反動派在湖南過去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特別懂得學校在這個地方作用之大，因此李鎮長、曾省齋、謝祖堯、王鳳喈之類國民黨大黨棍，都是親自抓住學校，當董事長，當校長，當主任，當教員，什麼都有份。鄧幹子在書中問是「獨出心裁」，別樹一幟，他所做的一切，就其反動影響比較起來確是形式新穎得多，作用深刻得多。他的本事（「國粹」和「西學」都有一套），他的身分（不辦黨務），他的做法（「五子一貫制」比以前任何學制更能把學生扣緊在讀死書和死讀書的範圍之內），都有其「與衆不同」之處，特別是當蔣介石王朝瀕於崩潰的時候，反動派在學校中的地位，在進步力量的衝擊之下，動搖了，垮台了，鄧幹子的一套却仍舊能够「我行我素」。當然，他這一套並沒有能够使舊社會制度能多苟延殘喘一下，「一木焉能支大廈」，蔣介石王朝的大廈從基石到棟樑都腐朽了，鄧幹子「學術」再好些，辦法再妙些，也是枉然。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過於低估他這一套對於青年的損害。

作為思想類型來看，尤其應該加以重視。我們應該把鄧幹于這種思想的實質及害處揭發出來，使大家不再上當。

解放以來，帝國主義固然是被趕走了，封建階級固然是被打倒了，但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文化教育的影響仍舊存在，在未經改造的知識分子中間，還有不少人以帝國主義和封建、買辦勢力的「孤臣孽子」自居，為它們抱靈牌。對於這種情況，當然不應該熟視無睹，應該予以改造。至於鄧幹于思想，它的反動性質——並且是完整的典型性質，今日似已大白於世了，應該沒有疑問了。但是在解放以來的幾年間，鄧幹于思想及其支配之下的行案中，學一直是「我行我素」，並且以「五年一貫新學制」和「艱苦辦學」的幌子冒充革命的進步的東西。現在，當揭發並初步批判鄧幹于思想之後，仍有人為他抱屈，似乎這是小題大作；似乎這不是原則上分歧的問題而是無端揭人陰私；似乎還是以今日的眼光完全責備，抹殺了「老教育家」的「功績」……像這樣是非不分，一直和鄧幹于思想起共鳴作用，要求我們把罪過算作功德，把反動的教育當作有用的遺產加以保全和接收，難道不是嚴重的問題嗎？這不是已經用事實來自行證明鄧幹于思想的討論是完全必要的嗎？「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這是真理，我們完全應該照此辦事。去年在討論「武訓傳」的時候，曾有一批人認為多此一舉，「反正武訓早已不在了，好的醜的都成了過去，何必算陳年老賬呢？」但是，拆開來看，原來他們之所以抱此態度，正是因為武訓並沒有成為過去，武訓精神仍在到處活動，而這一批人只願保存武訓精神並給它披紅掛彩，却不願批判它，損傷它。去年我們沒有十分抓緊「武訓傳」的討論，以致有許多錯誤思想糊塗觀念沒能澈底揭發批判。例如向反動派歌功頌德，投降效順；高唱「教育救國」、「辦學就是功德」，誰拿了錢來就是好人，不問他錢是何由而來，也不問拿這筆錢來辦什麼性質的教育；用「科學」、「技術」、「文化」的名義和實際上的名利思想為反動派造爪牙、造奴才，力圖把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動禁阻在大門之外，却還自命「清高」，「離險峻」，「離政治」，「我行我素」。

素」；裝做「善行」的樣子，「孤高」的樣子，與官府縉紳唱雙簧，一面有「禮賢下士」、「愛才與學」的老爺，一面有「孤高傲上」、「艱苦辦學」的先生，以此來給「末世」「亂世」(反動統治階級潮於動盪的時代)粉糊接刷，蒙蔽青年們純潔的心靈……諸如此類，請問該不該打爛砂罐問到底？如果沒有勇氣打爛，自然就不願為「武訓傳」來「多此一舉」，更不願為鄒幹于思想來「傷腦筋」，而是推說得越乾越越越好。如果今天仍繼續保持思想中的這種混亂和糊塗狀態，不僅是耽誤了自己的改造，而且誤了國家的建設事業。

問題更明顯些：是要進步還是要落後？是要貫徹新民主主義文教政策還是要貫徹錯誤的和反動的思想？是要用馬克思主義還是用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的文教事業？還是要聽憑封建、買辦、法西斯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來信口文幾種地？如果是要前一種而不要後一種，那就必須積極地參加思想改造，勇於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勇於改造。鄒幹于思想的討論就是思想改造的必要的具体步驟，大家(包括那些老本本家)都要來積極地客觀地分析、研究，自由地正確地發表意見，把這作為一面鏡子來照照自己，這是嚴肅的思想鬥爭，不應該有含糊的「息事寧人」的想法和作法。過去在反動派統治之下，進步與落後、革命與反革命，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奪取文教陣地的鬥爭。今日，文教事業在國家建設中有着極其重要的作用，我們就應該把這種鬥爭精神發揚起來，要求繼續進步，要求在思想上對反動派的鬥爭獲得全勝……徹底肅清反動思想。爲了這個目的，應該揭發和清算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的思想和活動，不許其繼續損害青年和人民，如對鄒幹于思想，就要深刻地加以分析，使其再無活動或借屍還魂的餘地；並且要因鄒幹于思想的討論而深入一步檢查自己思想中所包含的反動影響，用虛心的態度，看看進步究竟到了什麼程度，今日能不能趕上客觀形勢的發展，如果趕不上，甚至發現兩者之間有很大的距離，就要研究是什麼緣故。當我們這樣做了，而且認真做了，我相信教育界思想改造就會得到很大的勝利。

湖南教育工作者

應重視鄔幹于教育思想的討論

湖南教師社評

自從本刊對鄔幹于的教育思想與辦學實際活動展開批判以後，已獲得了一些教育工作者的關切，特別當新湖南報的讀者揭發和批判了鄔幹于的一些教學上的實際活動之後，引起了許多曾經直接受過他的教育的青年們的熱烈關心，像湖南大學的行事校友對此會展開了討論，從他們自身的體驗中揭發了很多生動具體的材料，使我們對鄔幹于教育思想的認識前進了一步。因此，關於鄔幹于的教育思想的討論，在目前儘管還有各種不同的看法，但就教師們關心的程度講，是遠過於過去報刊上對陶行知、陳鶴琴思想的討論的。這是因為鄔是湖南人，他主要從事教育工作的地點也在湖南，他的思想，他的工作，被我們所熟悉，而且在思想上與我們很多舊教育工作者有其共同之點，只是程度上與表現的形式上不同而已。

鄔幹于的思想本質是什麼？根據現在所揭發的材料看，他決不只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在他的某些「教學理論」上，如主張兒童本位主義，主張造工具；在教學方法上，如模仿了道爾頓制的「一時一事」原則，主張「自學輔導」等等，是從美國杜威那裏販賣過來的。但是從鄔幹于的「道德教育」（也就是他的所謂「公民訓練」）內容看，他主張「絕對服從」，在學校裏建立團體式的「輪隊制」，又經常向學生灌輸親美、崇美和反蘇、反共的思想，這些東西是鄔幹于把杜威主義的反動觀點「中國化」了，使它更適合於中國反動統治者的需要。

鄧幹子的教育思想的另一面，就是濃厚的封建主義的教育思想。他的「道德教育」的內容與方法大都是屬於封建主義的範疇的。如「輕步細語」、「男女授受不親」，動輒打罵，家長式的統治等。同時，人們不應該忘記，鄧幹子曾在日本受過多年的高等教育，對日本帝國主義國家內那一套「管理」方法，十分嚮往。因此，他的教育思想成爲一種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的混合物，却又穿著「清高」的「超政治」的「教育家」的外衣，毫不足怪，這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經濟基礎上舊教育界的產物，因而他也就得到了蔣介石反動政權的支持和稱贊。

鄧幹子的教育思想與我們湖南舊的教育界有什麼相同之點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回顧一下解放前近數十年來湖南教育是一副怎樣的面目。

解放前湖南教育的一個特點，是中等教育在數量上很發達，私人辦學的很多，這是大家所公認的事。至於這些教育的內容是什麼呢？那些興學的「教育家」是一些什麼樣的人物呢？大家不難記得，近數十年來統治湖南最久的反動頭子何健，不遺餘力地在學校中推行復古讀經和八德教育，對湖南教育事業的損害，至深且鉅。近數十年來被認爲教育界「楷模」的胡子靖，他的「應世教育」，他的「以校爲家」等等論調，實質上，也是封建主義教育思想的具體表現。鄧幹子與胡子靖創辦私立明德中學的助手之一，無疑地接受了他的思想影響，但他卻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胡子靖後來爬上了「政客」的階梯，而鄧幹子却成爲「教育家」了。這也就使人對他的認識更易於迷惑。

顯現了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的教會學校，在湖南舊教育系統中也佔有一定的「地位」，買辦教育思想在湖南是有地盤的，這方面也是可以找到代表人物的。自然，這種買辦思想的確證，並不限於教會學校中，在其他的學校也是宣揚過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的，雖然鄧幹子並沒有在教會學校工作，但他確是一個買辦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

湖南的教育陣地上，過去反動思想的統治是很嚴密的。解放三年來，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

下，學校裏各方面進行了許多不同的改革，可是在教育工作者本身，還沒有脫胎換骨地改造自己，教育思想上的反動影響並沒有得到澈底肅清，因而阻礙了人民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

現在我們為什麼要展開對於鄒幹子的教育思想的討論呢？因為鄒幹子的思想中存在着爲工人階級思想所不相容的、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的思想，此外還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思想，這些思想，在我們今天的教育陣營中並不是個別的現象，而是一般的，甚至是根深蒂固的。過去，我們被他的某些現象所迷惑，我們看不見，看不深，現在，經過揭發批判後，使我們的認識前進了一步。因此我們把鄒幹子的教育思想，展開討論、批判。但有些教師仍然覺得鄒幹子辦學的動機不壞，艱苦精神很好，中學六年級前五十年也辦得，現在不加表揚他，反而加以批判，這是什麼道理呢？現在仍然想不通。

爲了解決這些問題，爲了在教育思想上分清是非，劃清工人階級與其他階級的思想界線，湖南的教育工作者們，應該重視鄒幹子的教育思想的討論，在各級學校裏面，應該展開討論，通過對這一具體人的思想與實踐的批判，來聯系自己，檢查自己，批判自己，以求得澈底地澄清我們教育工作者思想上的混亂現象。

鄒幹于教育思想和辦學活動概述

一、前言

新湖南報文教組

鄒幹于教育思想及實際活動的批判開展以後，已得到廣大教育工作者的注意與關心。這是湖南教育工作戰線上一場嚴肅的思想鬥爭，全省教育工作者們都應來參加這場鬥爭，並聯繫自己進行分析批判，以便提高我們的思想認識，把學校中殘餘的封建、買辦、法西斯思想進一步廓清；同時也使教學上的資產階級思想受到初步批判，從而樹立無產階級的教育思想與教學方法，給今後思想改造運動打下較鞏固的基礎。

這裏，我們就目前已收集到的資料，把鄒幹于的教育思想及實際活動情況，分類整理如下，以供大家進一步開展討論的參考。

二、鄒幹于辦學的經過

一九二七年，鄒幹于從美國回國，到私立明德中學擔任教導主任，後來離開。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復回明德中學任初中部教導主任，當時，據他自己說「即有改革中學學制之意」，但因人事關係沒有搞好，碰了釘子，所以「竟不果行」。但是鄒幹于在明德中學時期仍有很大收穫，就是在這個時候，他結識了盤踞湖南最久、毒害青年最深的偽教育廳廳長朱經農。這個人對他以後的所謂鄒制實驗，作了極大的「鼓吹」與「調護」。朱經農寫給他的信，都編印入冊，題為「光榮之頁」。可見鄒幹于對他的感激之情。

再度離開私立明德中學之後，一九三七年，鄒幹于就到臨澧擔任偽教育廳第二科科長了，「思欲

蔣政令推行改革」，並且把所有的證件盡送偽銓敘部，以取得做官的資格，一心想爬上去。有些人以爲鄒幹子「沒有穿過號褂子」、不想做官，這難道是事實嗎？在關建，鄒幹子並沒有搞出什麼東西來。不久，「他又改變他的生活，走向實業界，到（天津）永利化學工業公司工作」，這個時期是根本沒有見到他有辦學的意圖了。

抗日戰爭爆發了，鄒幹子從天津回來，住長沙河西烏山，當時一些因抗戰而失學的學生，找他補習英語。從此他就開始以「一時一事」、「自學輔導」、「減少每班人數」爲原則，進行「實驗」，強迫學生領讀死記，這就是所謂「私人授徒」時期。「行之一年，以所得獻之前廳長朱經農先生，往返商榷，改革之計畫定」，有了反動官僚的支持，鄒幹子的辦學才開始實現了。一九三九年秋，大地主任王選他主持私立崇德中學，並同意開辦實驗班。

一九四〇年春，鄒幹子與偽省參議員方克剛合作，在藍田妙高峯中學附設實驗部，但招生很感困難，好容易收了七十來人。這時鄒幹子提出了品行方面八個基本訓練的綱目，即輕步、細語、整齊、清潔、簡單、樸素、勤學、服從。「從日常生活中去教導學生……如何洗臉漱口，如何吃飯，如何大小便，如何睡覺……」。

這年暑假，轉到文藝中學與曹典球合作。那一期，朱經農及偽督學先後都來考察過，「認爲成績優異，特准增加班次，擴充實驗」。但是「苦於無屋招班」。新化官僚資本家大惡霸段楚賢「有意興學」，招鄒幹子到他家裏去，於是他帶了「實驗部」投往澧澧湖段的私宅，並接受他四千元（光洋）的捐助。一九四二年前，鄒幹子又回到文藝中學。在上述時期，都只是限於初中的實驗。

初中實驗班第一班畢業後，鄒幹子便想辦高中實驗班了，金鑄資本家兼大地主楊培甫慨然答應每期出四千元（光洋）津貼他，於是招收了高中實驗一班。正在這個時候，國民黨五十四軍軍長龔揆彰（即後來昆明李、聞血案的劊子手）「慕鄒先生之名，函電交馳」，請他主持匪軍子弟學校——

五四中學。於是鄒幹于又帶了高初中兩個實驗班到南嶽投募了霍揆彰，擔任該校副校長（霍擔任校長），這時他在「南嶽曲」裏寫道：「名山氣象萬千，庶幾吾所止」。可見當時相當躊躇滿志和心安理得。

由於楊培甫「決定作進一步的贊助」，願意捐出「一千二百石湖田和開辦費三十萬元創辦一個中學，所以鄒幹于再回到新化去主持這所學校，這就是行素中學。鄒幹于對於這個大地主兼資本家的捐助，是感激得無以復加的。捐出的契約，鄒幹于稱爲「建立在犧牲個人、服務民族兩觀點上的一紙偉大的契約」，楊培甫捐出時寫的幾句客套話，鄒幹于認爲是「人類珍貴書牘中的幾句」，並且「創一年一事紀念辦法」，編了一冊歷史教科書來紀念楊培甫，又在楊培甫的生日作了一齣「長生曲」來歌頌他，規定學生必唱。

抗日戰爭勝利後，行素中學遷來長沙絲茅冲。朱經農雖然已經離開湖南，但是擔任偽教育廳長反動頭子王鳳喈，對鄒幹于的「鄒制實驗」依然是支持的，派了偽督學去考察，認爲「平日訓導有方」、「校風嚴肅」，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給以「明令嘉獎」，並且發給補助費一百五十萬元。鄒幹于說他辦學沒有得過反動政府的津貼，那是騙人的話。

三、鄒幹于辦學爲誰服務

從鄒幹于進行所謂「中學五年一貫制」實驗的過程中，明顯地看出來，無時不是受封建地主、官僚、軍閥、資本家的支持，也無時不是受反動政權的支配。因此鄒幹于是毫不隱諱辦學爲反動政權服務的目的，在行素高中向偽教育廳立案的呈文中說：「①適應需求，解決初中畢業生之升學問題，以樹高等教育之根基，而副總裁（即人民公敵蔣介石）十年實業計劃人才之需要……②協助政府（指國貨）（中學）五年一貫之實驗……」。

我們還可以舉出鄒幹于招生「投考須知」的規定來具體地說明上述目的，在「實驗班」「投考須知」第三節「請估計自己的力量」中說：「認清了我們的宗旨，體諒了我們的苦心，還請估計你們自己的力量。就是：凡家境不裕，確無升學財力的；天才欠缺，各科不能平均發展的；性有偏嗜，不願各科造成同等成績的；家庭姑息，時常要請假回去的；胸無定見，隨時見異思遷的；身體虛弱，不能吃苦耐勞的；性情固執，不願接受嚴格訓練的，儘可不必報名。」親愛的讀者們！你們看，鄒幹于對待「無升學財力」和不願做奴才（即不願受嚴格訓練）的學生，是採取多麼堅決拒絕的態度！試問，當年什麼人最「有升學財力」呢？那幾具有封建地主、買辦官僚及資本家的子女了。鄒幹于替封建階級辦學校是多麼「忠心耿耿」！

拿教育為反動派服務，這是反動政權統治下一般舊教育工作者不能逃避的命運，但鄒幹于並不同於一般舊教育工作者那樣，只是爲了個人生活而爲人師，糊口塗塗，在客觀上推行國民黨的反動教育，而他是把國民黨的「國家法令許可地位之獲得」與地主、官僚、軍閥、資本家、「私人經濟支持之獲得」認爲「不次之榮」，因此要「矢予報國之忱，罄予盡瘁教育之志」爲他們服務。這不是明明白白告訴我們他要「反動教育政策的推行者嗎？」

四、鄒幹于反動的教育觀點

鄒幹于出身於封建家庭，受過很深的封建教育，同時，又留學日本、美國共達十年之久，受了資產階級的杜威教育學說的薰陶，在他的教育觀點上就把兩者雜拌一起了。鄒幹于培養學生最高的目的就是「適應社會生活」，成爲「明日的公民」。在他的教育理論上有所謂「修道率教之哲學系統」。這個「哲學系統」是根據「中庸的基本觀念」、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他把這三點「合之近代教育哲學」，解釋爲「性是受之自然的本能，這是順本能而發展，教是修改或

抑制壞的本能，培養好的本能」。因而他得出「中庸的推論」說：「性有善惡，道有君子（道心和天理）和小人（人心和人慾），教在去惡揚善」。又引申為「近代教育哲學的推論」說：「本能有 *Desirable* 和 *Undesirable*，聽本能發展即萬惡並陳，修改或抑制壞的本能，有教之必要，培養好的本能，有教之可能」。

教育是什麼呢？教育的作用是什麼呢？加里寧說：「教育是對於受教育者心理上所施行的一種確定的，有目的的和有系統的感化作用，以便在受教育者的心身上，培養成教育者所希望的品質。」又說：「共產主義教育的基本主要任務，便是要最高限度地幫助我們的階級鬥爭。」（「論共產主義教育」）這就是我們的觀點。可是，鄒幹子却認為教育（即他所謂的「率性」「修道」）「是順本能而發展」，零零碎碎地、毫無目的地對「本能」作些修改、抑制或培養。這不就是杜威「生長論」的說法嗎？根據這個「哲學」，所以鄒幹子只教有「天才」的學生，「投考須知」上說：「天才欠缺的……性有偏嗜的……儘可不報名。」又說：「好學生自家了悟，先生是幫忙者。」把學生分成「天才」與「非天才」兩種人，還不是反動的唯心論嗎？所有的學生都任他們「順本能而發展」，毋怪他們要「我行我素」，變成只注意鼻子尖下的小節的庸人。這個反動的「哲學」危害太大了。

當然鄒幹子也提到要「去惡」「揚善」，但善與惡的標準是什麼呢？他認為都要看是否「適合於上層社會的需要」，因此「輕步細語，整齊清潔，簡單樸素，勤學服從」，是必須做到的；而「懷疑、反抗」，「違反黨國法令和思想不正」，甚至吐痰、放屁等等，則是要反對的。做到了前者，那就適合於上層社會的需要，就是「善」，達到了「君子」和「明日的公民」的標準，可以做一個馴服的工具和奴才了。如果是後者，那就是「惡」，就是「小人」，「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鄒幹子是不教「小人」的，結果是「辭教」或一聲「滾」，請你們出門。

五、「卽制五年一貫實驗」的內幕

卽幹子進行「卽制五年一貫」的實驗，其動機除了前面說過的迎合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需要之外，就是感到當時「學制流弊甚多，其大者有三：①時間之浪費太大；②程度之低落太甚；③留級之結果太酷。而此三大弊端的產生，實由：①學生上課時間太多；②復習時間太少；③每班人數太多；④同時學習課程太難」。他「針對這四點，提出改革方法：①增加自修時間；②減少上課時間；③減少每班人數；④實行「一時一事」之學習原則。」

實際上，卽幹子這樣分析當時國民黨反動教育的三個「弊端」，其中「程度之低落太甚」和「留級之結果太酷」，並不是什麼辦法的問題，而是國民黨反動教育毒害和欺騙學生必然的結果。至於「時間之浪費太大」，實質上也是由於國民黨反動教育當局對待學生採取壓迫、統治和毫不負責所造成的。卽幹子故意撇開這些本質的問題，而斤斤於犯中學學制由六年改為五年一貫制，這種改革，對國民黨規定的反動教育內容未更動一根毫毛，反而提早一年替反動派遣出奴才和「工具」，使青年學生身心遭受更大的損失和毒害。「卽制五年一貫制」的實驗，實質上是依附於國民黨整個反動教育體系，作它的補充和點綴而已。「卽制五年一貫制」的反動性就在這裏。

所謂「減少上課時間，增加自修時間」，也是硬趕課程進度，強迫學生死讀書的幌子。這裏我們引一個為教育廳督學的視察報告就可以拆穿他的西洋鏡了。這位督學說：「每週數學十七小時，每日須上課三小時，而應做練習當非三小時所能竣事，再加其他各課工作所需時間，每日學生應工作十二小時以上。」又說：「今集三、四週之（數學）練習令于一週內做齊，時間上是否能許可做到？」「該校國、英兩科集中教學時期，每週上課時數均多，而練習時間和次數未能比照增加。」「且自無科實習，以儀器藥品缺乏，未能一一行於實驗，結果影響甚鉅。」還套辦法，其舉果可以想見。

至於「一時一事」的搞法，報上已經指出過是拾杜威的餘唾，是把完整的知識及課程的科學系統性加以割裂了，「一時一事」的實驗，使行素中學的學生不能獲得一個中學生所應有的普通知識。如萬五班、初二班都經過了「數學年」的，按進度已超過其他學校一個學期以上，但實際水平落在別校之後。至於其他史、地、理、化等課，則任其自流，從沒有系統的學過。如初二班（原五年一貫制五班）本期是初中畢業班了，上述各科仍不夠標準，本國歷史差一本，外國歷史沒有學過，本國地理只學了三個大行政區，外國地理差一本，物理也教得不多，正在加緊趕學。」（「解放後鄧幹干的教學思想及教育活動」）事實明白地告訴了我們，「一時一事」的理論與做法完全是片面的、非科學的，也是違反「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的。

六、反動的鄧制國文、歷史教科書

鄧幹干的反動思想也具體地表現在他主編的教科書上。鄧制五年一貫制實驗十年之久，但僅編有國文和歷史教科書兩種。他特別着重編這兩種教科書，就可見他對於政治思想是何等注意。

鄧幹干親手編的國文教科書內容是些什麼呢？他說：「我們第一年級內所選文章，從聊齋誌異與開微草堂筆記兩書所選較多」。第一冊全書共六十五篇，這兩本書的選文佔了三十九篇，他認為這些「材料較合剛從小學入中學學生心理」。請看他把什麼東西認為適合學生心理的吧！「①關於倫常慘變，可歌可泣文字；②關於類似偵探文字；③關於奇趣文字；④關於鬼神文字之類似神話，一見而知為幻想者；⑤關於社會情況描寫，而為中學一年級學生所能了解欣賞者。」他所鄭重推薦的「仇大娘」和「勞山道士」，就是典型的例證。

編選教科書最重要是選文標準問題，鄧幹干編選國文的標準是什麼呢？一共十項，即：「①思想正確；②字彙明顯；③篇幅適中；④理論健全；⑤結構靈活；⑥文詞暢達；⑦興趣濃厚；⑧參證便易

：④體例適用；⑤作風純正。」這裏着重就思想正確、興趣濃厚、作風純正這三個重要部分來談。

談到編國文教科書，鄧幹于「無限感慨」地對學生說：「假使你們在英美，我想你們至少可以舉出一兩打你最喜歡的小說著作，和幾十冊最喜歡讀的小說名稱……他們不僅給你們以文字技術上的修養，並且還可供給你們身心發展上的刺激。可惜目前我們尚談不到這層。」誰都知道，我們祖國是一個有悠久和燦爛的文化的國家，我們的祖先留給我們許多偉大、優秀的文學作品，而鄧幹于却一筆把他抹殺，認為只有英美才有文學！

在這個主導思想的指導下，試看他如何解釋「思想正確」原則吧，他首先要學生認識「所處的時代與地方」，他說：「你們處在二十世紀科學萬能的時代，兩個原子彈可以壓倒一個民族。你們跟着賢明領袖，和祖國的諸部，而獲得世界中的地位，你們在一個這樣美滿而比較顯彰自傲的時代……究竟應該抱些甚麼思想？」他指出：第一，「……我們都是三民主義的信徒，則三民主義的思想自然支配着我們全部精神，所以我選國文教材也當刻刻留心，希望使它能直接間接發揚主義光大主義」。第二，「文字要求合乎科學」。但他却認為「聊齋誌異」中「談狐說鬼、扶乩仙問卜」的文章「也合你們好奇的口胃」。第三，「求其合於國情」。他說：「我國先輩先賢，還給了我們一種中和而不趨極端、悠久而富有彈性的文化，這種文化，以前有人叫作國粹，又叫國故，我們應該了解、珍重、愛護、發揚。」了解和發揚祖國優秀的文化遺產，是我們光榮的任務，但如果分不清「精華」與「糟粕」，一口全吞，那就錯了。因此，用什麼「中和而不趨極端、悠久而富有彈性」這樣意義含混、莫名其妙句子來加以概括我國文化遺產，那是荒謬的。第四，「合乎時代精神」，「我們決不幻想將來和祖咒現在，所以我們的讀文，也要吻合這種思想，至少不要違反這種思想傾向。」這就是教學生對「將來」不要有任何理想，對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現在」，也不要發半句怨言，要老老实實安分守己。第五，「合乎青年人生觀」，要「覺得人生是一樂，是一種奮鬥，是一種努力。只問耕耘、不問